

佛教改革的先行者杨仁山及其佛教振兴理念*

施保国

内容提要：杨仁山被称为“佛教改革的先行者”，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旁通”儒道的方式，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是创办金陵刻经处和精舍学堂，培养佛教人才，开创了正规佛教教育的先河；三是解行合一的佛教观，在佛理上和修行实践上为后世留下典范；四是编纂三字经，对于佛教文化在社会大众及信徒中的传播普及，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杨仁山 旁通儒道 金陵刻经处 解行合一

作者简介：施保国，广东嘉应学院社科部讲师，博士。

一、杨仁山信佛缘由及佛教振兴理念简介

杨仁山，字文会，安徽石台县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卒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杨仁山自幼聪颖，“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之术，靡不探赜，韞之于心”，（《杨仁山居士别传》）但他成就最大的还是对于佛教事业的杰出贡献。杨仁山在佛学方面造诣精深，十宗并重，性相圆融，堪称佛学大家，被称为中国近代佛教改革的先行者。杨仁山自27岁时始真正接受佛教，到最终为佛教振兴做出贡献。那么他的信佛缘由是什么呢？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在西学东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传统儒学已难以支撑局面，佛教反而担起拯救民族文化和民族危机的重任。杨仁山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在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做了实地考察后，认识到精微广大的佛教文化是适应时代变革的思想宝藏，并切身感受到佛教是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增强国民道德性的思想利器。杨仁山认为，佛教不仅在国内已打破“独尊儒术”的局面，而且已逐渐走向世界，成为不同文化之间沟通和了解的桥梁。因此，宗教救国成为一种需要，他选择了信仰佛教作为实现理想的手段。另外，从国际情况看，西方对佛学越来越重视，直接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近代以来，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国的佛教思想，反对战争崇尚和平，颇受西方学者的青睐。中国的邻居日本也非常重视佛学。在国内，佛学的研究逐渐被重视，梁启超即把佛学作为“国学的第二源泉”。

其次，杨仁山信佛及从事佛教事业，与他的入世爱国思想也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清政府衰败无能，加上西方列强野蛮入侵，使国力衰弱、社会动荡，杨仁山对此深感痛心。他出访欧洲，发现欧洲各国强盛的原因在于“有学”，而当时中国社会仿效西方只是学其皮毛。而因明、唯识二学是佛教之逻辑知识论、现象认识论，此二部佛学，力图与现实相沟通，掣入近代精神，与西方科学相近，转佛教的出世为入世，变超越为参与，以致法轮再转，佛光重现。

再次，从主观认识方面来说，杨仁山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境遇，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进入新的层次，迫切需要佛理来圆满其答案。从佛教理念上说，中国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理念、平等理念以及慈悲理念，与西方宣扬的平等、博爱相类似，振兴佛学，能够为这

* 本文为全国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安徽佛教文化研究”（编号：04BZJ005）和梅州市社科联与嘉应学院联合立项科研项目（2011SKY04）阶段性成果。

种“西学东渐”的学术环境所接纳。佛教恩泽众生的理念让杨仁山选择了佛教。后来，杨仁山的弟子谭嗣同等极力宣扬佛教的平等慈悲救世思想，就是这种理念的传承。就个人感情来说，杨仁山信佛与他在杭州的一段情缘有关。据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传记《一个女人的自传》说，杨仁山因一事“逆了心愿，便不出去做官”。此一“逆了”的心愿指的是在母亲的坚持下没能娶杭州的相好巧姐为“并妻”。杨仁山觉得生活无聊，整日在西湖边游走。那一年（1864年），杨仁山的父亲病故，他自己也患病，终感人生之苦楚无处可散。杨仁山偶然得到《大乘起信论》、《金刚经》、《楞严经》之后，顿觉茅塞大开，于是专心阅读，“几忘身于书肆”，便决定研究佛学，利己利他，了此一生。

杨仁山对佛教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创新，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被称为“佛教改革的先行者”，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旁通”的方式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为佛教内容的充实提供新资源，显示了开放的胸襟；二是创办金陵刻经处精印佛经广为流传及创办精舍学堂培养佛教人才事业，他的僧陀教育实践开创了正规佛教教育的先河，之后掀起办学热潮，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复兴；三是他的解行合一佛教观，既在佛理上又在修行实践上为后世留下了典范；四是编纂三字经，对于佛教文化在社会大众及信徒中的传播普及，起到重要作用。以上几点也正是杨仁山的佛教振兴理念。在杨仁山的带动下，中国佛教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他的佛学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李叔同、马一浮等一批思想界翘楚都从杨仁山佛学理念中吸取营养。杨仁山的佛门弟子太虚继承师志，在激励佛教自身，痛除痼疾、推陈出新方面做出贡献，促进了佛教近代化并过渡到“人间佛教”的阶段；在佛教的义理研究方面，另一弟子欧阳竟无对唯识学研究贡献巨大，蔚成了近代以知识人士为主体的“居士佛教”的兴盛。

二、旁通儒道与大乘佛学的开放胸襟

中国大乘佛学有一个特点，即旁通儒道。在佛学史上，永明、憨山等旁通统贯，以佛释道、以佛释儒。杨仁山推崇贤首、高峰、莲池、憨山等高僧，在学术上一以贯之，继承并发展大乘思想的融通思想，体现了开放的胸襟。杨仁山《十宗略说》等充分体现了佛学的这种特点，即旁通儒道。杨仁山曾著有《论语发隐》、《孟子发隐》及《阴符》、《冲虚》、《道德》、《南华》四部发隐，以佛学思想阐释儒道。他认为，三家都是“先圣设教”，在世间法中亦“括世间法”（《学佛浅说》）。三教中，以佛理为最高，可以互通。在《与释惟静书》中，杨仁山写道：“近年闭户穷经，于释迦如来一代时教，稍知原委，始信孔颜心法不隔丝毫，柱下漆园同是大权示现。”必须透彻佛经方知儒道可以与佛相通。

杨仁山以佛释儒。如以“般若真空”释《论语·子罕》之“无知”、“空空如也”；以《坛经》之“对法”，释子质“闻一知二”；以华严宗“凡举一法，即具十门，重重无尽”释颜渊之“闻一知十”。以“我执”和“平等性智”释儒家的“克己复礼”：“己者，七识我执也；礼者，平等性智也；仁者，性静本觉也。转七识为平等性智，则天下无不平等而归于性净本觉点。盖仁之体，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孔子斥樊池弃世、独善为“小人”，杨仁山理解为孔子在行菩萨道，是一种“慈悲行愿”，“不许门人退入二乘。”批判孟子“未入孔圣奥堂”，批宋儒性理之学不与孔子之旨相同，“所谓穷理者，正是执取计名二相也。”（《评方植之向果微言》）。认为宋儒将佛家实效抹杀，单取性理之言与儒家拉杂凑泊，实毁佛。

杨仁山研究道家诸经，主要重于义理，他认为道家之深意与佛理相通。他认为《列子》“如开宝藏，如涌甘泉，实与佛理相表里”（《冲虚经发隐序》）。在《南华经发隐》中，他认为《老》、《庄》

之言，有世间法，有出世法。而“出世之言，或浅或深，浅者不出天乘，深者直达佛境。以是知老、庄、列三子，皆从萨婆若海逆流而出，和光混俗，说五乘法，能令众生随缘获益。”对于《道德经》中“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他以华严经“十世一会”来解释。以“真空妙有”、“阿赖耶识”阐释“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以“无始无明”阐释“混沌”，以“空如来藏”阐释“天门”等。当然，杨仁山是站在佛理立场“旁通儒道”的，虽方便多门，但最终却归元无二。^①

杨仁山旁通儒道，明显地受到故乡地域文化的影响。杨仁山的故乡石台县地处古徽州境内。二程、朱熹祖籍均在徽州，对理欲、心物、义利、道德、天人及其关系的逻辑论证，形成理性主义传统。在周边的九华山，佛道儒三教融合的历史悠久，形成杨仁山融通思想的文化背景。早在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九华山前，道教已传入九华山。西晋著名道士葛洪在此炼丹，至今留有遗迹。僧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道士一同修炼，现今还留下“道僧洞”等遗迹。王阳明曾在此招收弟子，弘扬儒学，带动了儒佛交融，现在九华山还存阳明书院。此外，宋代的大慧宗杲、明代的藕益智旭等都是融通思想的倡导者，也是杨仁山推崇的对象，成为了杨仁山佛学开放胸襟的理论来源。^②

三、创办金陵刻经处、兴办学堂与杨仁山的佛陀教育思想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杨仁山移居金陵，与一批同道研习佛学，相互讨论，创设金陵刻经处，发心刊印单行本《藏经》。与以前各种藏经不同，杨仁山出于利益众生的考虑，采用方册本（书本式）刻印流通，让一般读者方便携带、诵读。在杨仁山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多年中，印行经典达百余万卷，佛像达十余万张，为当时的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起到了很好的弘法效果。

当时刻出的第一部经典是魏源所辑的《净土四经》，杨仁山亲为之作跋，盛赞净土法门的殊胜。这篇跋文写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后人便将这一年定为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始。杨仁山亲赴各地搜求佛教散佚典籍，特别是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失传典籍。他在国内寻访古刹，在国外考察寻经，其中在日本就寻回多种失传的隋唐古德注疏，如《中观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和《因明论疏》等。

金陵刻经处的创立，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大事。受其影响，江都郑学川因发愿刻经而出家，号“刻经僧”，在扬州设立了江北刻经处。^③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评价杨仁山：“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刻经处有开启之功。^④

传统佛教之培养僧才，靠的是早期寺院的译经讲学及唐以后的丛林制度。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改革了印度佛教乞食习俗，僧众可自食其力，安居修道。丛林教育制度，是“知行合一”，融宗教生活与教育为一体，如禅堂修行、上堂开示、相互辨析、读诵经典等。但明清后，丛林制度渐趋没落，仅剩下一个躯壳。杨仁山认为，中国佛教之所以衰败，根源在于没有新式学堂造就人才！“诸方名利，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今欲振兴，必自学堂开始”，“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他建议政府“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由各省择名胜

① 吕建福：《复兴近代佛教之先行者——杨仁山居士佛学思想研究》，《法音》，2008年第12期，第13-20页。

② 周佩东：《杨仁山信佛缘由及思想根源探析》，《池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1-54页。

③ 李向平：《救世与救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④ 吕建福：《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法音》，1997年第6期，第26页。

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教习公同选择”。^①

1907年，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祇洹精舍，正式开始讲学，培育佛教人才。当时的学者以出家僧人为主，其中有太虚、仁山、开悟、智光等青年僧人，居士中有邱虚明、谢无量等，欧阳渐、梅光羲也从杨仁山学佛。后来，祇洹精舍因经费不敷，在两年后停办，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祇洹精舍是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创办的僧学堂。杨氏弟子太虚秉承师志，积极倡导佛教革新，提倡人生佛教理念，于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后又创办汉藏教理院和接办闽南佛学院等。弟子欧阳竟无，于1922年创办支那内学院，将办学之风延续下去。

在办学方式上，杨仁山主张新式佛教学堂，分教内教外两个班。外班学“新法”兼佛学，内班学佛学兼普通学。“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渐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支那佛教振兴策》）。他的佛教教育内容、教育思想和体制在当时是先进的。第一，普通学，包括本国文理、史学、地理、算法、梵文、藏文等，外语占的比重大。第二，课程参照“佛教各宗大小乘大小学校种种章程”来规划佛学课程内容。第三，在体制上，参照社会学校的体制，“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各三年，共九年制学校。只有九年学成，始得称大和尚。杨仁山将佛教教育与僧伽制度结合，是对传统僧制的大胆改革。而且，学修并重为其特色，不同于后来佛学院的“以学为主”的情况。

在具体经典的阅读上，杨仁山认为，因从解路入，先读《大乘起信论》，研究明了之后，再阅读《楞严经》、《圆觉经》、《楞伽经》、《维摩经》等，渐及《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论，然后依解起行，行起解证，证入一真法界，仍须回向净土，面对弥陀，方能永断生死，成无上道。乃由约而博，由博而约之法也。（《学佛浅说》）。可见，杨仁山的佛陀教育理念已形成完整的体系。

四、从《大乘起信论》到净土与杨仁山解行合一的佛教观

杨仁山研究佛学，融会各宗，都是沿着《大乘起信论》而展开。他认为，“通过此《大乘起信论》，则《楞严》、《楞伽》、《华严》、《法华》等经自易明了。”（《与李澹缘书》），此论乃“学佛之纲宗”，“学佛之要典”。

与在教理上推崇《起信论》及华严思想一致，在践履上“行在弥陀”正是“教宗贤首”的结果。杨仁山在学佛实践上重视净土法门。在《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中，他说，“有一普度法门，速成不退，直趋佛果者，即念佛往净土法门也。”在《与李澹缘书》中，他说，“净土一门，括进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杨仁山以华严教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之境界来理解净土法门。他在《观无量寿经略论》中说，“菩萨行门，不出二种：一种上求诸道，二者下化众生。……谁谓华严、极乐有二致耶？”对念佛法门阐释之深入，观想念佛至深妙处，与华严境界无二无别，同人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可见，其念佛法门，非一办“持名”或“称名”念佛。

“念佛与称名有异，心中忆念，名为念佛，口称名号，名为称名。”（《观经略论》）。当然，杨仁山认为，净土应是自力、他力并重，反对将净土法门纯粹作为他力救度法门的倾向。他提倡读经，以深妙经论请去妄想，策励志气，可防止单持名号，日久生懈之弊。自力、他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然而，“教宗贤首，行在弥陀”这种解行合一必须建立在因明、唯识知识充分学习的基础上。杨

^① 引自张华：《杨仁山与近代佛教振兴》，《学海》，1998年第1期，第77页。

仁山认为振兴佛法的要门在于因明、唯识二学。此二学，自唐玄奘从印度引入后，一时隆兴，但终不能与传统文化相契合而趋于沉寂。受到西学的影响后，杨仁山非常重视这二门佛学，力图与现实相沟通，契入时代精神，使出世变为入世。整个近代佛学以“唯识”、“因明”为显学，又是杨仁山最先打开佛教的窗户，让西方吹来的科学知识新风吹走陈腐的气息。他在《与桂伯华书》中，特别强调要“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之楷模”，认为只有弄通了唯识思想，才能使人“不致颠陨笼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并把它看作是“振兴佛门之法要”。

五、编撰三字经，普济群伦

在东洋和西洋的历史与现实的参照中，杨文会认为，医治中国近代之衰的药方是宗教精神的发扬，而佛教对于危机中的中国尤其具有积极意义。他设想以清净的思想来消解人的欲望，以信仰的力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宗教戒律来整理社会秩序，使心灵有归属、人人有信仰、社会有秩序。为此，他在明季吹万老人的《释教三字经》的启发下，写成《佛教初学课本》。该书通过三字韵语的形式和简洁的诠释文字，系统而准确地阐述中国佛教的历史演变和基本教义。全书脉络清晰，体简义丰，以易读易记的三字形式几乎廊括了佛教的所有重要内容，包括佛教的渊源、传播历程、各宗派概念、要义和佛学核心思想，将深邃佛法理论之关键点拨而出。

杨仁山写作该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认为佛教伦理对于近代以来价值混乱的中国具有精神导向作用，这属于自救的方面。他坚持，“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①二是愿以佛教去拯救处于没落中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即“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这属于救人方面。^②但佛教要发生影响，需要靠在大众中的普及传播，靠教育。如何以简洁、易懂的方式向普通大众普及佛教知识，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杨文会编撰的朗朗上口的三字经便产生了。

另外，杨仁山认为，振兴佛教，不能固限于国内，必须与世界佛教声气相通，遥相呼应，方能壮大佛教，振兴佛教，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二》中说，“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事。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以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为全球第一宗教，其功岂不伟哉！”杨仁山不仅希望振兴佛教于中华，还要振兴印度佛教，甚至于以英文贯通华梵，促进佛教的国际交流及在西方世界的传布，并使之成为全球第一宗教。

（责任编辑 逸 轩）

^① [清]杨文会，李霞注译，诸伟奇点校：《佛教三字经》，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3页。